

中国基础教育 课程政策三十年 (1978—2008)

基于政策语境视角

彭彩霞◎著

中国基础教育 课程政策三十年 (1978—2008)

基于政策语境视角

彭彩霞◎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三十年：1978～2008：基于政策语境视角 / 彭彩霞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 - 7 - 5161 - 6243 - 9

I. ① 中… II. ①彭… III. 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政策—研究—
中国—1978～2008 IV. ①G6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357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重点资助课题
“政策文本与政策语境——改革开放以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研究”
(课题批准号B-a/2013/01/025)研究成果

苏州大学省重点学科(教育学)经费资助出版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 总体演进(1978—2008)

第一章 绪论	(3)
第一节 问题缘起	(3)
一 亟待关注的课程政策领域	(3)
二 课程改革与课程政策问题为学术兴趣所在	(4)
三 国外学者研究视角的启发	(5)
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是课程与课程研究发展的典型 时期	(7)
第二节 国内外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研究述评	(8)
一 国内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研究的回顾与省思	(8)
二 当代西方课程政策研究述评	(16)
第三节 研究意义、路径与方法	(27)
一 研究意义	(27)
二 概念的诠释	(29)
三 研究路径与方法	(36)
第二章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总体演进(1978—2008)	(40)
第一节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之核心话语的变迁	(40)
一 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历史分期	(40)
二 各阶段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文本概览	(41)

三 主要视角:基础教育课程政策之核心话语的变迁	(42)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课程政策的总体演进轨迹	(53)
一 课程目标	(53)
二 课程结构	(57)
三 课程管理	(60)
四 课程实施	(61)
五 课程评价	(63)

第二编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多元语境(1978—2008)

第三章 作为我国课程现代化时间链条中的一环——历史语境的在场	(69)
第一节 在时间之流中理解课程改革	(69)
第二节 20世纪初课程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74)
一 壬寅癸卯学制时期的课程改革	(74)
二 1909年始实行的中学文实分科	(76)
三 壬戌学制时期的课程改革	(77)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课程政策的变革	(79)
一 1950—1956年的课程改革	(79)
二 1957—1965年的课程改革	(82)
第四节 前期“历史遗绪”与改革开放后的课程政策	(84)
一 对于课程的社会发展功能的注重	(85)
二 重视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德育课程以及德育在各学科中的渗透	(87)
三 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分科课程体系	(89)
四 国际视野下的本土观照不足	(90)
第四章 作为对广泛的社会变革的回应——社会语境的考察	(93)
第一节 经济语境下的课程政策	(94)

一 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对课程政策的制约	(94)
二 经济发展对于课程政策的要求	(95)
第二节 政治语境下的课程政策	(101)
一 第一阶段(1978—1985)	(101)
二 第二阶段(1986—1997)	(102)
三 第三阶段(1998—2008)	(103)
第三节 文化语境下的课程政策	(105)
一 第一阶段(1978—1985)	(105)
二 第二阶段(1986—1997)	(106)
三 第三阶段(1998—2008)	(108)
 第五章 作为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相关政策语境的构建 (110)	
第一节 教育的元政策和基本政策的引领	(111)
一 义务教育政策的推动	(112)
二 素质教育政策的引领	(115)
第二节 其他相关政策的推动	(119)
一 第一阶段(1978—1985)	(119)
二 第二阶段(1986—1997)	(121)
三 第三阶段(1998—2008)	(125)
 第六章 作为制定过程的产物——生产语境的剖析 (128)	
第一节 课程政策与其制定程序和主体的关联分析	(129)
一 个案1:《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的制定 (1989—1990)	(129)
二 个案2:《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制定 (1996—2001)	(132)
三 个案3:《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的制定 (2001—2003)	(134)
四 基于课程政策个案的关联分析	(136)
第二节 利益的博弈:课程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论争与妥协	(139)
一 案例1:“退学分”	(140)

二 案例2：“零选择”	(142)
第七章 作为世界课程改革的组成部分——国际语境的审视	(145)
第一节 国际课程政策变革的主流话语	(147)
一 课程目标：“全人发展”与“个性发展”	(147)
二 课程结构：“综合”	(149)
三 课程管理：“分权”(权力的共享)	(152)
四 课程实施：“学习方式”	(154)
五 课程评价：“发展性评价”“质性评价”	(156)
第二节 国际课程发展潮流下我国课程政策话语的迁嬗	(159)
一 对国际课程改革的经验,是我国课程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159)
二 我国课程政策话语的迁嬗	(160)

第三编 总结与省思

第八章 基础教育课程政策语境的多元与复杂	(169)
第一节 总结: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多元语境	(169)
一 课程政策在历史的承继与超越中发展	(169)
二 社会变革构成课程政策演变的重要动力	(170)
三 课程政策在相关教育政策的引领下前行	(170)
四 制定过程直接塑造了课程政策的特点	(171)
五 世界课程发展潮流成为我国课程政策变革的重要外在刺激	(171)
第二节 仍欲补充的几个方面	(172)
一 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构成课程政策不断调整的重要动力源泉	(172)
二 学术批判、反思与论争是课程政策变革的重要舆论动力	(173)
三 课程实验为课程政策的变革发挥了先导性作用	(176)

第四编 附录

附录 1	(181)
附录 2	(187)
附录 3	(197)
附录 4	(204)
参考文献	(210)
后记	(219)

第一编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 总体演进(1978—200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缘起

一 厥待关注的课程政策领域

课程学家贝哈（Behar）于1994年曾把整个课程领域分为11个部分（课程哲学、课程理论、课程研究、课程历史、课程变革、课程发展、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政策、课程），课程政策是其中一个部分^①。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天野正辉曾指出：“当代课程研究事实上涵盖了不可分割的三个层面问题的研究，这就是：（1）课程政策研究；（2）学校课程设计的研究；（3）每个教师的课程实施问题的研究。”关于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课程专家白月桥认为，课程政策、课程设计和课程实施三个层面既各自独立，又密切相关。在这三者当中课程政策居于主导地位，一个国家制定课程的政策决定着这个国家课程的特点，只有对课程政策进行大的变革，才能使课程设计和课程实施有大的发展。而在以往的课程研究中，学界不仅未能清楚地揭示这三个层面的区别与联系，而且各层面中不同范畴的问题也混淆不清，没有科学地揭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他提出，有必要对课程政策的变化、课程政策变化的社会动力、课

* 本章部分内容已发表，分别为：

《当代西方课程政策研究之回眸与审视》，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

《我国课程政策研究之探索：应然关注与可能思路》，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6期；

《基于政策语境视角的课程政策分析》，载《现代教育管理》2010年第2期。

① Linda S. Behar, *The Knowledge Base of Curriculum: An Empirical Analysis*,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程政策对课程变革的作用、课程政策与课程决策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①

然而，在传统的课程研究领域，人们往往不把课程政策当作一个“学术”问题对待，而把它完全当作一种政府行为，这不仅使课程政策的科学性及发展速度受到影响，也影响了课程改革实践的质量，进而影响了课程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因此，有关课程政策的研究亟待加强。

二 课程改革与课程政策问题为学术兴趣所在

这一研究课题的提出也与笔者较长时间以来的学术兴趣点有关。课程与教学论是笔者的硕士专业，课程的相关问题如课程改革、课程理论等是笔者一直关注的领域。在硕士阶段的研究历程中，笔者有一个强烈意识是：我们似乎总是如国际教育改革专家富兰所言的：“尚未在新一轮变革中学到什么，就匆匆奔赴下一轮。”

算起来，我国的课程改革频率与其他国家比起来应是不落后的，竭力在彰显着课程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时代需求的回应，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里，就有8次大规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国家共颁发课程计划（教学计划）20余套，也就是说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差不多每两年至三年都要发布一套新的课程计划。从“选修课程”“核心课程”到“活动课程”“校本课程”，从“小组合作学习”到“研究性学习”，从“愉快教学”“成功教学”到“个性化教学”“反思性教学”等，课程教学理念层出不穷。从新的课程表、新设备到新教材，体现着改革的确在不断繁荣着可触可见的、物质的产品。但这些改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课程教学风貌，似乎很难对此作出理直气壮的回答。

由此，在课程改革的问题上，改掉浮躁、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态，作一种理性、沉静的历史审视是非常必要的，历史研究通过追根溯源、爬梳剔理，往往对问题的探讨更为严谨、深厚。尤其如培根所言“历史使人明智”，历史能让我们更敏锐和智慧地面对现实。由此，博士阶段笔者选择攻读教育史专业，从历史的视角重点研究课程尤其是课程改革问题。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这种关注侧重于文本方面，而课程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制

^① 白月桥：《素质教育课程构建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定正确和明确的指导思想，它往往体现在制定出来的课程政策之中。另外，课程政策不仅是理论的提升与提炼，有其理论基础，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和准则，更重要的是政策本身具有约束力，可以规定和约束实践的方向、进程和标准——鉴于对课程改革的关注集中在课程政策方面，笔者对文本的关注也就集中在课程政策方面。

三 国外学者研究视角的启发

2008 年，笔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系访学一年，这段学习经历从多方面影响了笔者的学术研究。

首先，在资料的搜集和阅读中，美国课程史学家库本（Larry Cuban）有名的“飓风”隐喻引发了笔者的兴趣。他直言不讳地将美国大多数课程改革比作“海上的飓风”——“海上狂风大作，波涛汹涌，而海床却波澜不惊”。就是说，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的旋风在不断掀起，新的课程理念不断涌现，与此相关的理论基础也在此消彼长，但教学实践仍保持以教师为中心的稳定模式，对此他以一个多世纪以来 7000 余例课堂的研究为佐证；改革并未能真正改变“教育实践的内核”，教师如何理解知识的性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角色，这些知识观与学习观如何在课堂显现，等等。对于这一问题库本主要从文化的视角切入，从社会文化、学校文化、教师职业文化、教学文化等方面作出了解释，凸显了作为“海床”的已有文化的巨大“惰性”和“隐蔽性”。虽这一视角与我的研究路径不相一致，但对于其著作的阅读使我有机会切入了解课程改革的其他相关研究视角。

譬如，博依德（Boyd, W. L.）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也关注到了课程改革的问题，“在二十多年系统改革的努力之后——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新课程材料到最近联邦发起的革新项目——近来的研究（如古德莱德；Berman& MaLaughlin）已经揭示，与诸多的主张相反，真正的变化很少。我们因此需要理解这一矛盾，似乎要有很多重大变化的依据的，但如何变化却如此少”。改革为何未能致使其产生真正变化，他从政策的视角进行了诠释，他认为，我们通常对这一问题最简明扼要的解释是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但是，“在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实施之间这一极其重要的差距中，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自身有着抑制变革的

对立因素”。^① 他的这一视角启发笔者从政策制定过程方面来思考问题。

而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悠久醇厚学术氛围的熏陶下，在课堂的耳濡目染中给笔者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带来最大影响则是“语境”（Context）这一术语。在一般意义上，“context”是指文字作品中有助于理解一段话或一个词的“上下文”，也常翻译成“背景”“情境”等。在美国，无论是教授在课堂讲授、学生之间的讨论和交流还是学者的论文或著作，都非常注重对言辞、观点或者人物、事件的具体语境、特定背景的介绍、追问和争辩，因此这是使用相当频繁的一个学术研究术语。这启示着笔者从课程政策文本产生的语境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再仅仅集中于静态的文本本身。

在文献的阅读当中，发现有不少政策研究者对“语境”都有一定程度的关涉，比如科德（John A. Codd）就指出：“政策文本……是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建构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文本。解构的任务应始于对那个语境的认知。”^② 同时，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也强调，政策科学有三个主要属性，其第一个属性即为语境性（contextuality）；英国政策社会学家史蒂芬·鲍尔（Stephen Ball）和理查德·博（Richard Bowe）提出政策文本（policy text）和政策语境（policy context）的概念，等等，都加深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思量。

其次，泰勒（Sandra Taylor）和亨利（Miriam Henry）等人合著的《教育政策与变革的政治》^③ 一书帮笔者打开了从“语境”切入的思路。他们认为：首先，政策语境应包括导致政策进入议程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与此相关的是压力群体的影响和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它们是如何迫使政府作出清晰的声明来回应的；其次，制度和话语不能剥离于它们历史的根，除了这些语境的当下方面，还包括塑造政策的历史背景，涉及这一政策之前的发展与举措；再次，政策也是互联的（inter-textual），即它们总是与其他同类政策相关，从而需要一并考虑博尔（Ball）用来指

^① William L. Boyd, “The Politics of Curriculum Change and Stability”, *Education Researcher*, Vol. 8, No. 2, 1979.

^② John A. Cod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Vol. 3, No. 3, 1988.

^③ Sandra Taylor,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代“相关政策总体”的“政策群”（policy ensemble）概念；^① 最后，还应该考虑全球的语境，同时，还要考虑核心人物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总括起来，政策文本的语境关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语境、历史的与当下的语境、相关政策的影响、核心人物的作用、国际语境，等等，这些维度使笔者的研究目标和思路变得逐渐清晰。

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是课程与课程研究发展的典型时期

之所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几十年，是课程发展的重要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共进行四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第五次课程改革（1978—1980）；第六次课程改革（1981—1985）；第七次课程改革（1986—1997）；第八次课程改革（1998—当前）。而在所有影响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因素中，课程政策居于核心地位，它是课程改革的直接指南与动力”。^② 每一次课程改革，都是课程政策调整的产物。课程政策直接影响着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对各个阶段的课程政策的研究，也就是对各阶段的课程改革的研究。

其二，这三十多年也是课程研究迅猛发展的时期，这当然离不开课程领域在自身知识的累积与传承中的反思与创造，更是与课程改革的推行与不断深入对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大量诉求即“内需”分不开。

同时，在这一时期，西方各种课程理论也在大量的译介书籍和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中，获得广泛的传播与关注，从政治性、种族性、女性主义课程话语到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及自传性课程话语，各种思潮与流派竞相涌入，在解读和吸收的过程中还引发了不少的论争。这一切构成了课程政策丰富的国际语境，由此，在课程政策文本中，也就出现了对他国政策话语的复制或“挪用”等现象。

^① Stephen J. Ball, “What is Policy? Texts, Trajectories and Toolboxes”, *Discourse*, Vol. 13, No. 2, 1993.

^② 胡东芳：《课程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

第二节 国内外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研究述评

一 国内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研究的回顾与省思

(一) 研究概况——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课程政策”为题名检索（截至2009年9月），并剔除有关高校或职业学校课程政策、学前教育政策等，相关文献共计64篇，其中绝大多数文章都发表于2000年之后，只有2篇文章写于2000年之前，其一是《英国的课程政策与教学文化》^①；其二是《略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改革方向》^②。在这两篇早期论文中，对于“课程政策”这一关键词并未予以任何界定，作者尚未将它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术语从而对研究对象予以严格限定的意识。

在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的检索中，题名中含“课程政策”的专著共有3本，均属于国别研究，分别是对俄罗斯、澳大利亚和英国课程政策的研究。^③

在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学术期刊网上能检索到的有关学位论文（包括台湾）共有11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5篇^④，硕士学位论文6篇^⑤。

^① 徐继存：《英国的课程政策与教学文化》，《外国教育研究》1999年第5期。

^② 崔允漷：《略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改革方向》，《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9期。

^③ 张男星：《权力·理念·文化——俄罗斯现行课程政策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谢少华：《权力下放与课程政策变革：澳大利亚经验与启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蔡清田：《课程政策决定：以国家教育改革法案为依据的课程决策》，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④ 胡东芳：《课程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彭清源：《我国国民中小学课程政策执行模式之建构：以九年一贯课程政策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2002年；蒋建华：《知识·权力·课程：走向多样化的义务教育课程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张红：《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价值取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王玲：《博弈视野下的课程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

^⑤ 王宝玺：《地方课程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师范大学，2003年；何杰：《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方宏常：《论我国三级课程政策的运行策略》，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王桂林：《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取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师范大学，2004年；周勇军：《课程政策实施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柯政：《地方政府的课程政策的执行行为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